

全球智库半月谈

《纸牌屋》与人民币汇率

大数据使用中的得不偿失

外国投资者：没有永恒的天堂

关于美国原油出口的十个事实

乌克兰何以能迈步前行？

我们对美国的不安感

本期编译

陈 博

程覃思

杜元哲

丁 工

郭子睿

黄懿杰

黄杨荔

孔莹晖

刘 洁

李 骁

李 想

马文龙

孙 东

苏 丹

（按姓氏拼音排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国际战略研究组

《全球智库半月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主编的中国社科智讯数据分析报告的组成内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为您提供。

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

主任	张宇燕		副主任	何帆
首席专家	张斌	开放宏观		
团队成员	刘仕国	欧洲经济	徐奇渊	中国经济
	吴海英	对外贸易	曹永福	美国经济
	冯维江	新兴市场	肖立晟	国际金融
	高凌云	对外贸易	熊爱宗	国际金融
	梁永邦	宏观经济	杨盼盼	国际金融
	匡可可	国际金融	魏强	国际金融
	茅锐	新兴市场	陈博	科研助理
	黄懿杰	科研助理	李想	科研助理
	孔莹晖	科研助理	黄杨荔	科研助理

国际战略研究组

组长	张宇燕		副组长	何帆
召集人	徐进		协调人	彭成义
团队成员	李东燕	全球治理	袁正清	国际组织
	邵峰	国际战略	徐进	国际安全
	薛力	能源安全	欧阳向英	俄罗斯政治
	黄薇	全球治理	冯维江	国际政治经济学
	王鸣鸣	外交决策	高华	北约组织
	卢国学	亚太政治	王雷	东亚安全

彭成义	中外关系	徐秀军	全球治理
田慧芳	气候变化	李 燕	俄罗斯政治
任 琳	全球治理	丁 工	发展中国家政治
赵 洋	科研助理	刘 畅	科研助理
周 乐	科研助理		

联系人: 黄杨荔 邮箱: iwepceem@163.com 电话: (86)10-8519 5775 传真: (86)10-6512 6105

通讯地址: 北京 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1543 邮政编码: 100732

免责声明:

版权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预测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和国际战略研究组所有, 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 如有违反, 版权所有人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全球智库半月谈》所编译的文章, 仅反映原文作者的观点, 不代表编译者、版权所有人或所属机构的观点。

目 录

世界热点

电子货币变得现实 4

导读：电子货币例如比特币坠入凡尘，与现实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互动，因此也产生了诸多新动态。本文从比特币在近期出现的事件入手，分析并讨论了比特币等电子货币在可信的第三方监管、订立合同等相关方面的问题，指出比特币等电子货币给现有的规则逻辑带来了巨大挑战。

《纸牌屋》与人民币汇率 7

导读：政治题材美剧《纸牌屋》的热播使得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很多分析者认为，美国的施压是让中国政策制定者允许汇率升值的最有效方式。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

全球治理

全球价值链 10

导读：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贸易模式有着重大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尤为突出。本文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如何影响了收入和增长、竞争程度的衡量，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

全球视角下的宏观审慎政策 15

导读：本文在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宏观审慎政策下的国际协调。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和审慎的资本账户管制都会通过资本流动来产生国际溢出效应。协调一致的宏观审慎政策很难被保证，除非一些国家出现了失业。

大数据使用中的得不偿失 17

导读：本文思考了大数据使用中的问题，指出在缺乏隐私保护下，大数据的使用很可能让人得不偿失。这其中包含隐私被泄露、身份被定位、信息被倒卖等风险。人们必须重视这类风险，并建立起相应的保护机制。

经济政策

欧洲银行进退两难 19

导读：本文对包含 20 个全球性银行在内的样本进行分析，观察金融危机后银行面临的困境。作者认为，欧洲银行对低杠杆率和高资本率的追求使之陷入了矛盾，对此问题的解决须借助于彻底的战略变化。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选择：国防与经济 24

导读：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中国实力日益提升使美国感到不安。但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不同，美国的大部分盟国都不希望与华为敌，且中美经济联系紧密，美国不可能复制遏制苏联的成功。

外国投资者：没有永恒的天堂 26

导读：全球危机巅峰时，美元升值、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资产成为主流。事实上，他们不过逃入了短期国债中。本文认为，包括美国资产在内，没有证券能在不同危机中永葆避险资产地位。然而，美国证券的特殊性在于，即便危机源自美国，外国投资者也无须“竞相退出”。

关于美国原油出口的十个事实 29

导读：页岩气和致密油革命之后，美国能源产量大幅提升；但由于遗留问题，美国原油面临着出口限制。作者列举了十点事实，认为应放松出口限制。

聚焦中国

中国改革从空气开始？ 31

导读：北京污染已“接近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程度”。2012 年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治空气污染，建设“生态文明”。但是，防治污染措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行政命令式的措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战略观察

乌克兰的三个方案 33

导读：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乌克兰经历了两次主要冲击。乌克兰的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为暴力的变革之一，而且不仅限于原苏联范围。俄罗斯军队对克里米亚的干涉，极具争议

性地构成了自 1990 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安全危机。这些事件将继续伴随着乌克兰国内外相互矛盾的叙事和相互冲突的宣传。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危机造成的政治失控并吸取教训，以防止相似的事件在未来再次发生。思考未来政策应对的一个有用方式是，围绕可能的方案来组织它们。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至少有三种方案：回到过去的状态、克里米亚的“德涅斯特化”，以及一个充满更多军事干预的未来。本文由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尼库·波佩斯库撰写。

乌克兰何以能逐步前行？ 36

导读：要想知道乌克兰向何处去，就应当知道导致其动荡的根源——寡头精英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漠视以及对俄罗斯的政治误判。而乌克兰成功转型还是有希望的，希望在于改革——能源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作者认为美国介入到乌克兰的转型进程中并非明智之举，而欧盟的帮助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对于乌克兰的成功转型却有着重要意义。

埃尔多安在德黑兰 38

导读：2014 年 1 月 28-29 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德黑兰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首次会晤，土耳其分管外交、能源、经济的三位部长一同参加了会谈。

我们对美国的不安感 40

导读：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美国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在调整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布局 and 重返亚太的同时，又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这引起部分日本学者的担忧，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将转向保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本期智库介绍 42

电子货币变得现实

Preston Byrne /文 刘洁/编译

导读：电子货币例如比特币坠入凡尘，与现实世界产生越来越多的互动，因此也产生了诸多新动态。本文从比特币在近期出现的事件入手，分析并讨论了比特币等电子货币在可信的第三方监管、订立合同等相关方面的问题，指出比特币等电子货币给现有的规则逻辑带来了巨大挑战。编译如下：

上周对比特币来说是恐怖的一周，“交易延展性”（其实是一种分布式阻断服务攻击）进入我们的视线，“丝绸之路 2”的 270 万美元的比特币被盗，俄罗斯禁止比特币交易，苹果应用商店的紧随其后。比特币以美元计价的价值惨遭腰斩，就如 14 天前那样。

如果有人认为“电子货币时代已经结束”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该产业并不仅仅指比特币，从整体来看，该市场呈现的是另一番景象。虽然过程缓慢但确定无疑，简单的加密机制正在演变成一个多边生态系统，而在这些发展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是 Ethereum（以太坊：下一代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应用平台）的建立，这是一个为智能合约协议的运作而搭建平台的项目。

“究竟什么是智能合约？”你问。

如果比特币是密码学在支付体系上的运用，那么智能合约就是密码学在贸易中的运用。传统合同条文——从协商、创立到执行决议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法规体系，以及一些如买一杯背后涉及大量法律条文的咖啡一样直白的东西。法院在后续审查时调用这些条文，用于决定已某些行为是否违法，并做出公正裁决。

从自由主义者的角度看，该体系存在大量缺陷，其中最主要的在于它授权政府基于公共政策、税后（增值税、印花税）、或福利目标（计划收益）等方面对私人合同的内容进行干预。这就限制了个人自由，并且干预了价格理性。

最著名的一个备选方案是 David Friedman，他提出完全废除法庭，支持私人仲裁机构（其实是庞大的法律集团）基础上的私人执法，以及今天的信用评级机构类似的评级和披露体系。然而无论在 Friedman 的体系中还是现有情况下，一个“可信的第三方”（法庭或某个机构），对于整个体系的管理而言非常必要，这是比特币能够解决的问题。就如比特币被设计为成从支付体系中移除可信的第三方，Nick Szabo（美国法律与经济学家）在 1997 年写道，智能合约

也将消除商业合约中的信任问题。他指出，“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合同和法律都要以这种静态方式写下来，权力机关进行解释和执行”。但是智能合同将对诸如银行等金融中介造成威胁，它们还将威胁到权力机关，通常金融中介要服从于这些权力机关，例如监管部门和法院。

当程序设计员声称，块环链移除了对可信第三方的需求，律师就会反击称块环链本身就是可信的第三方，但其与先例相比有很大差异。它就是一个机器人，承载了非常尖端的功能，但没有人的特性，没有工作地点，没有财产，并且不做任何声明或保证。比起那些人类机构，它更类似于一种自然的力量，像天气一样。因此它会对简单的分类产生挑战，并会带来更加棘手的问题，而不是一些诸如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已经出现过的很明显的问题。

例如，一位比特币“矿工”发现一块矿岩，将其吊起在错误的高度¹，但这并不是他的错。这一系列动作在英国合同法下或许符合构成单边合同所需的行爲，这使他可以获得全部价值。然而，当网络中的成员一致否定时，他所得的比特币就被判定为无价值；他应当获得什么追索权？他应当起诉谁？——那个块环链吗？针对网络的集体诉讼吗？该讨论中所有使用电子货币的人都有连带责任去赔偿原告的损失，还是履行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原则，即那个不幸的矿工默许了网络会抛弃他的可能性？

想要在更为细致的层面上审视这些电子货币交易，是不是应当首先研究电子货币的产权呢？比特币并不是铸币（纸币），也不是某一账户的贷方金额（这并不是钱，而是金融机构依照合同要向存款人履行的合同义务）。实际上，块环链缺乏订约能力。与某一特定地址相关的余额本身并不是一种金融工具或权利，例如支票或本票；这仅仅是个历史记录，它证明该交易和相关的私人密钥已经有效发生了。

从更为宽泛的类似原因来看，块环链产生的“私人密钥”也与正常的所有权分类法有所区别——如果你偷走了一张带有私人密钥的纸，这就是盗窃；但是如果你发现了一张带有私人密钥的纸，拍了张照片，并通过这个密钥获取电子钱包并据为己有，那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这并不是说产权（即某种可实施的承诺）不能以比特币，或者任何其他电子货币计价；或者说电子货币实际上并不是财产——很明显它们是财产（即使

¹ 结果是使用更早期软件的矿工和商人拒绝接受他的成果，但新版比特币使用者则接受。

现有法律还没承认这一点)。在解决可信第三方问题时，电子货币给我们曾假设的现有规则逻辑带来了更具实质性的挑战。而且这还是仅仅讨论比特币，而不涉及那些即将出现的自主性分散式企业。

没有人能说当真实世界和电子商务世界开始逐渐融合时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确信：继续观察这一问题将会充满乐趣。

本文原题为“Cryptocurrency gets real”，作者 Preston Byrne 是 ASI 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2 月刊于 ASI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纸牌屋》与人民币汇率

Kent Troutman /文 苏丹/编译

导读：政治题材美剧《纸牌屋》的热播使得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问题再次引起人们关注。很多分析者认为，美国的施压是让中国政策制定者允许汇率升值的最有效方式。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编译如下：

2014年2月14日，政治题材美剧《纸牌屋》热播，众多争议随之而来。令很多观众吃惊的是，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剧情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剧情中，在国内拥有实权的中国官员和美国能源巨头相互勾结，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他们从而在政治和商业上获益。经济上的主要冲突则在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汇率操纵行为的不满。在一个场景中，中国官员表示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情况，让中国政策制定者允许汇率升值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美国的施压。否则，某些固有的利益群体会使得汇率的改革难以进行。

抛开这部电视剧的热门程度，这部分剧情确实反映了中国改革支持者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里我们将会简要地讨论一下来自国外的压力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上的改革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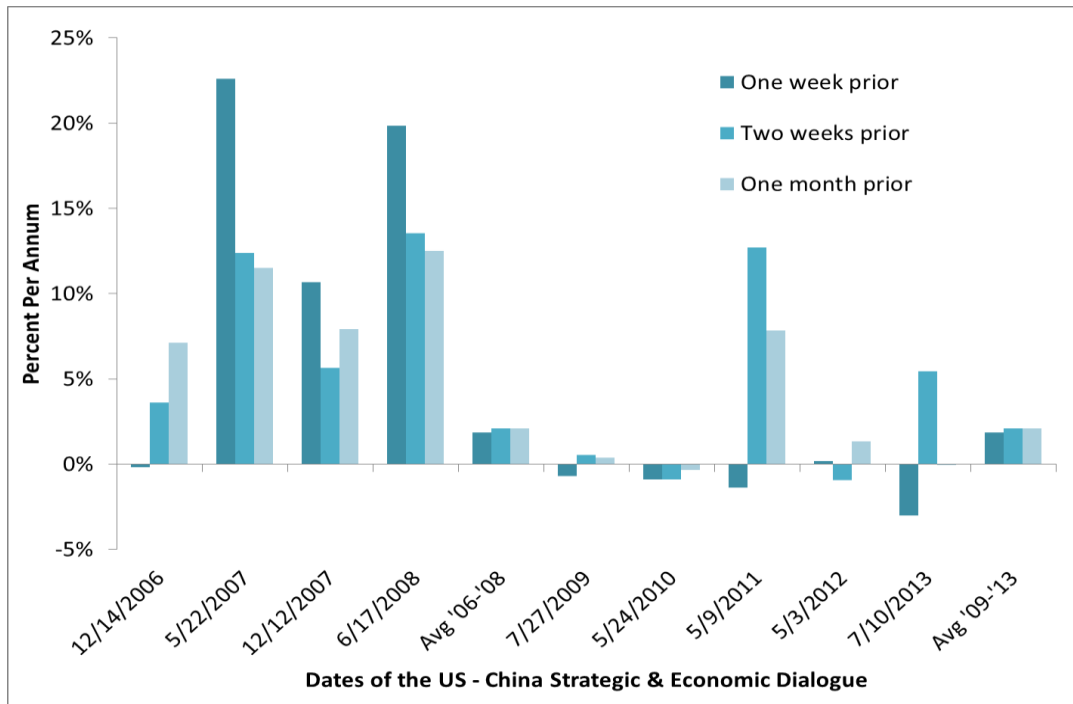
关于外国的政治压力是否会对汇率政策有影响的讨论有很多。例如，2008年一篇HKMA的文章从统计数据的角度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外国的政治压力会影响到汇率升值改革的步伐，但是也不能排除会对汇率的波动有影响。然而，很多分析者和评论家都发现，中国的确会在某些重要的中美双边会议开始之前允许人民币有一定程度的升值，这就是外国政治施压的明显案例。正如图1所示，在小布什时代的确存在这一现象，不过最近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Gary Hufbauer在《中国汇率争论》这本书中提到，来自单边对抗形式法案的压力不太可能会使得汇率争议国国内的强权群体加快升值的进程。Hufbauer认为，多边对抗法案的方式更有可能有效一些。然而，并不意外的是，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对手通常都会面临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上的冲突，从而不愿意进行合作。的确，和贸易以及一些监管政策的合作不同，货币上的合作要带来共同的收益非常困难，每一个政府都倾向于最大化本国的利益。因此汇率政策的主要改革推动力量仍然来自国内，而不是来自于国外政府的压力。

那么关于汇率改革的争论目前情况如何？在最近的一项声明中，中国政府承诺今年会在原来的模式上允许汇率日交易波动区间的扩大。尽管中国仍然有权利将汇率设定在任何他们所喜欢的水平上，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步。

从 2012 年开始，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超过 3%，但改革仍需要进行。在 2013 年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位之后，我们认为仍然会有持续升值的可能。

图 1 中美双边会议前人民币升值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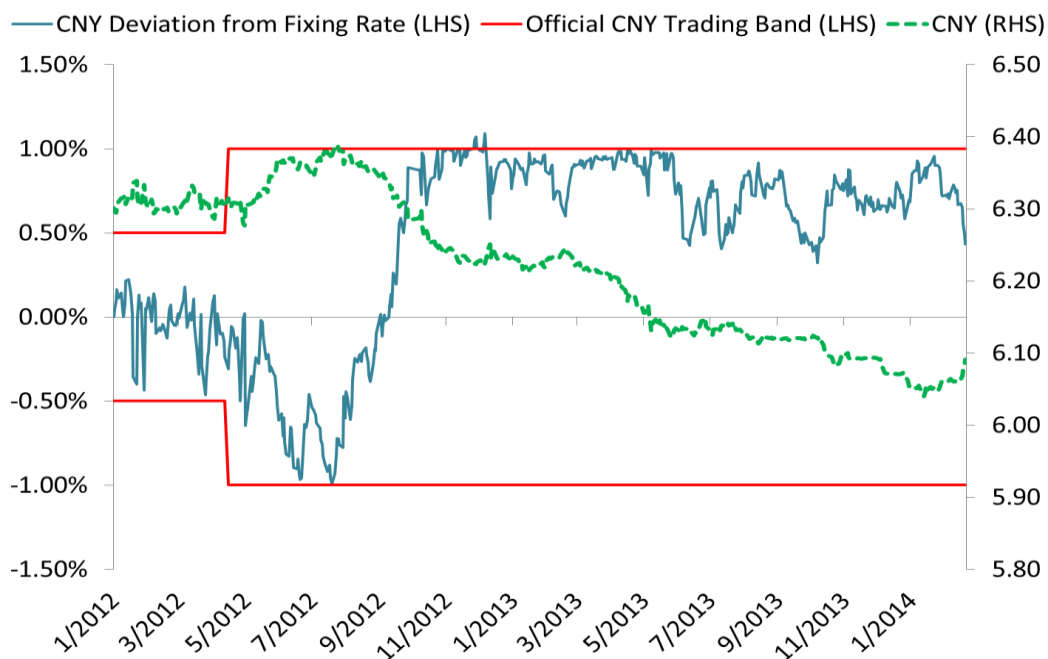


来源：FRED 数据，美国财政部和作者的计算。

然而，正如所有改革一样，习李政府大刀阔斧进行的改革项目必然会遭到大量的反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特别是来自制造业和金融行业的固有势力，都会受到改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一定会坚决反对金融行业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当然，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比较依赖当地金融行业和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也有可能反对改革。除此以外，在政府内部，也会有很多官员会从目前的格局中谋取私利，从而不愿意支持改革。

正如在过去的五年内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所证实的那样，将现有利益群体连根拔起并且进行大幅度改革需要承担很大程度的风险。在中国，尽管改革已经在最高层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具体政策要得到实施还很困难。尤其是在汇率政策上，中南海的改革者们需要强调继续干预市场的成本，并大力推行汇率自由化。

图 2 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波动



来源：Bloomberg 和作者的计算。

本文原题为“Playing the Cards Right, or Playing the Right Cards: Foreign Political Pressure and China’s Currency Policy”。本文作者 Kent Troutma 为 PIIE 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2 月 刊于 PIIE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价值链

Michele Ruta, Mika Saito/文 李想/编译

导读：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贸易模式有着重大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出现尤为突出。本文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如何影响了收入和增长、竞争程度的衡量，以及贸易政策的制定。编译如下：

787 梦想客机——波音公司的最新产品，是闻名的美国产品，它在华盛顿州组装并销往世界各地。然而，梦想客机不仅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生产。许多部件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制造：中央机身来自意大利，飞行舱的座位来自英国，轮胎来自日本，起落装置来自法国，货舱门来自瑞典。

飞机只是跨国制造的例子之一，汽车、手机和医疗器械等越来越多的产品在一个地方最终生产，但其投入品却来自其他许多地区。这归因于过去二十多年来贸易壁垒的减少和通信成本的降低。我们称这种发展为全球价值链，它正改变着全球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形成方式。同时，竞争的性质也受到了影响。国家之间是在产品上竞争，还是在投入生产的劳动力和资本上竞争？反过来，竞争性质的变化也改变着贸易的模式，以及旨在促进竞争的政策的形式。

显著的增长

过去二十年里，贸易发生了惊人的增长，这可以在中间品跨国流动的规模上得到反映。全球出口与进口的比值从 1995 年的 20% 上涨到了 2009 年的 25%（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曾达到 30%）。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种增长尤为突出，比如中国的这一比值从 23% 增加到 39%，欧元区北边的国家则从 30% 增加到 40%。

总出口相对总进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作为制造过程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中间投入品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然而，估计价值链对增长和收入的影响，需要总出口之外更多的信息。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价值，与该国对出口产品增加的价值，是两码事。所谓的附加值出口就代表了该国的劳动力和资本收入。

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是否为参与链条的国家带去了财富？简洁的回答是，是的，但是不同经济体内，以及不同经济体之间，财富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通过出口为全球生产做出了贡献，但是其中有些国家的增长速度更快。全球来看，附加值出口占世界 GDP 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15% 上升到了 2009 年的 20%。在这段时间里，劳动和资本收入都有增加，其中资本收入增加地更快，因为附加值出口的产品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密集型行业。

增长不仅仅出现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收入越来越多地通过出口服务而来，而服务的出口易受离岸外包影响。通过金融、通信、商业和其他服务部门的直接出口，或者作为制造业产品的一部分的间接出口，服务出口带来的收入占总产出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6% 上涨到 2008 年的近 9%。

附加值出口的增长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参与全球价值链似乎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些专门进行产品组装的国家，他们进口昂贵的核心投入品，为这些投入品增加相对而言很小的价值，最后出口的产品其附加值主要来自国外。对这些国家来说，出口的附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较低。尽管他们承担的是附加值很低的组装程序，这些国家的出口仍然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换句话说，他们的附加值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很高。而且，这些国家恰恰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增长相对较快的国家，这或许意味着，一个国家或经济体融入全球价值链之后，会有重要的学习效应，并对其他经济体有各种形式的正向溢出效应。比如，当地企业可能从外国企业使用的新技术和外国投资带来的良好商业环境中间接受益。

竞争力测度的改变

自 2012 年 12 月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以来，日元兑欧元和美元的汇率贬值了近 20%，这可能为日本的亚洲贸易伙伴带来两方面的影响。在出口上，他们的产品要与更为便宜的日本产品竞争。但另一方面，日元贬值也可以降低他们从日本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的成品。哪种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该贸易伙伴与日本产品直接竞争的激励程度，以及该国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来自日本的进口对其产品生产的重要性。

经济学家测度一国价值竞争力的标准方法是计算该国的真实有效汇率，也就是相对于贸易伙伴国的货币篮子而言，该国货币的购买力。然而，这一测度方法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贸易产品仅为最终消费品，并且产品完全在各自国内进行生产。在被价值链连接起来的世界里，这样的假设显然是不成立的。近年来，有两种方法将全球生产分化纳入了实际有效汇率的测度当中。二者侧重点不同，但都提供了新的视角。

方法之一是构造一个指数，使用生产产品的工序而非产品本身来测度竞争力。这一指数更适于测度一国生产要素（即劳动力和资本）的竞争力。另一种方法仍然使用产品来衡量竞争力，但同时考虑了生产过程中进口投入品的情况。这一指数更适于测度从一国出口的产品的竞争力。

从实际数据来看，标准的真实有效汇率和将全球价值链纳入其中的新指数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异。例如，根据新的测度方法，中国从 1990 年到 2011 年真实有效汇率的累计升值程度提高了 14%到 27%。换言之，新方法所揭示的中国竞争力的下降程度，比传统方法得到的结果更甚。主要原因在于，新的方法更好地捕捉到了这一时期内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的迅速上涨。而两种方法得到的额外升值程度有所不同，这取决于以生产工序还是产品来衡量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不仅将最终品的买方和卖方联系在一起，也将参与产品价值链生产的所有经济体纳入其中。因此，价值链中的国家间汇率的变化可能比传统的真实有效汇率更为重要和复杂。新的指数想要发挥出政策分析的效用，其计算需要更多的工作和更多的数据，尽管如此，它们仍是解开复杂的价值链关系的重要一步。

模糊的边界

尽管 WTO 所推动的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泥潭，但一系列重要的自由贸易谈判涌现出来，它们并非全球范围的，却已经包含了许多大型经济体并覆盖了全球贸易的主要部分。例如，2013 年美国 and 欧洲开始协商“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 TTIP），另一个正在谈判中的重要自由贸易协定是包含 13 个成员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 TPP）。价值链的增长，加深了国际商业的复杂程度，同时使得贸易和国内政策之间的界限更为模糊，这就呼唤新的贸易规则尽早出台，而上面说到的这些贸易协议正在协商制定这样的规则。

供应链条将跨境商品、投资、服务、技术和劳动力联结起来，有人称此为“供应链贸易”。供应链贸易在最终品上与传统贸易有显著区别。在供应链贸易中，企业必须在许多国家建立生产设施，并且通过人力、资本和技术的流动将这些工厂联系起来。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挑战来自两个方面。首先，国内政策对国际贸易的阻碍比过去更为严重。举个例子来看，对知识产权和投资权益的保护力度不够会

伤及全球贸易链，因为将生产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会增加企业知识和资本的国际曝光度。其次，全球贸易链的增长创造了新的政策溢出效应，因为影响作为全球生产链的一部分的本国生产的政策，也会影响到整个价值链。这些挑战使得一个全球贸易协定成为必要。但这样的协定的内容，不再是遏制关税壁垒，而是保证管理价值链不同部分的各国政策之间的一致性。

支撑供应链贸易的新规则和纪律正在并将继续被制定，主要途径是各项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这些协议常常包含一些超出 WTO 承诺范围的强制执行的规定。WTO 对覆盖全球贸易 90% 的 96 个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一项调查，调查表明这些协议的核心规则管理着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投资和资本流动。比如，这些协议中的 73% 都包含了超出当前 WTO 要求的竞争政策的内容。虽然有许多其他因素促进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诞生，例如地缘政治的考虑和 WTO 多边谈判的困境，但治理供给链贸易的需要是相当重要的推动力。

自由贸易协定和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关系对经济有着全方面的影响，而政策讨论中却常常忽视这一点。

贸易谈判的模式将影响到未来价值链的格局，后来者只能适应由他人协商而来的规则。这可能带来多边贸易系统的监管漏洞，并阻碍价值链的未来发展。多变化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重要课题。

新一轮贸易协定的浪潮将会扩大成员国之间政策和经济冲击的传导作用，并削弱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传导作用。这是因为参与到跨境生产的企业不可避免地会对突发事件更为脆弱和敏感，那将打乱正常的要素输入。

估计贸易协定的影响的经济模型，一般将侧重点放在受保护部门的高关税被移除之后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像 TTIP 和 TTP 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内容是非关税措施，重点在于可能对增长有直接作用的跨境生产上。因此，这些协定对经济福利的作用，可能与现有政策讨论中的结果大不相同。

经济后果

过去二十多年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本质，并对收入的形成、竞争力的衡量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有重要影响。它所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贸易领域的近期发展有着重要的宏观经济后果，包括经济增长、国家竞争力和冲击的传导机制。

我们的研究有三大结论：第一，全球价值链创造了财富，但不同国家的财富增长速度有所不同。第二，全球价值链也改变了竞争力的意义，使得竞争力

的衡量更加侧重于企业的跨境生产。第三，全球价值链加深了国家之间的互相依赖，政策合作愈加重要。

本文原题为“Chained Value”。本文作者 Michele Ruta 为 IMF 战略政策回顾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Mika Saito 为 IMF 非洲部门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于 2014 年 3 月刊于 IMF 网站。
[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全球视角下的宏观审慎政策

Olivier Jeanne /文 郭子睿/编译

导读：本文在一个简明的理论框架下分析宏观审慎政策下的国际协调。国内的宏观审慎政策和审慎的资本账户管制都会通过资本流动来产生国际溢出效应。协调一致的宏观审慎政策很难被保证，除非一些国家出现了失业。编译如下：

金融危机之前，负责金融稳定的政策制定者没有意识到存在于经济繁荣之上的金融脆弱性，鲜有国家采取审慎的宏观政策。而在此之后，各国纷纷把审慎的宏观政策作为实现金融稳定的一种新型工具。本文旨在研究宏观审慎政策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关系。

宏观审慎政策与国际资本流动具有双向关系。宏观审慎政策不仅受到资本流动的影响，还会影响资本流动，而且二者都会产生预期外的国际溢出效应。例如：新兴市场国家出于谨慎的目的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但会对美国的金融稳定造成威胁。从概念层面上来说，这样的溢出效应不足为奇。在相互交融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些国家采取审慎的管制措施扭曲了金融资本的流动，必然也会对自身的金融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我们很想知道宏观审慎政策在全球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全球是否存在国际规则和协调机制。为实现这一目的，我提出一个简明的框架来分析宏观审慎政策的国际影响。该模型假设某些金融协议会产生负外部性，因为他们会增加系统性债务的风险。宏观审慎政策可以纠正这些负外部性所引致的扭曲。

然后我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所导致的国际溢出效应。关键的结论是宏观审慎政策是一种互补策略（博弈论术语）。在非合作均衡博弈里，一个国家采取宏观审慎政策会扭曲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动，这会导致其他国家采取更加严厉的宏观审慎政策。从而，全球经济处于一种无效率的状态。

尽管存在上述溢出效应，国际上采取协调一致的宏观审慎政策还是有希望的。这是因为，由宏观审慎政策引致的溢出效应并不是真正的负外部性。这些溢出效应可以通过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全球利率得以缓解。当存在名义上的摩擦时，审慎的宏观政策降低全球利率的倾向会变得不确定。通过对扩展的凯恩斯模型分析发现，不一致的宏观审慎政策会使一些国家甚至所有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并伴随着一定的失业率上升。采取协调一致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助于提

升全球需求，从而使失业经济体受益。这样，国际上采用协调一致的宏观审慎政策就会出现帕累托改进。

最后，我研究了国际上采取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前景。发现：如果各个国家不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将会阻碍他们追求实现各自的目标。

总结

通过建立简明的理论框架，我们做了如下研究：（1）比较分析了在小的开放经济体中分别使用国内审慎政策和审慎的资本账户管制的福利效应；（2）研究了不协调使用这些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3）研究了在全球水平上采用协调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主要结论如下：（1）国内审慎的政策通常要比资本账户管制要好，但前者的实施通常遭受更多的限制；（2）这些政策存在国际溢出效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遵从国际规则或采取国际协调一致的政策；（3）如果全球需求疲软，国际协调政策有望实行。

因此，采取协调的国际宏观审慎政策有望实现，但没有我们预期的那样强烈。协调一致的政策依赖于全球的需求状况而不是国际间的溢出效应。这意味着协调一致的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当需要实施协调一致的政策时，也许我们应该争取得到 G20 的大力支持。而且，我们很难动员那些就业充分的国家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

此外，我们认为一些地区实行审慎的资本账户管制是可以容忍的，但并不鼓励。新兴市场经济体应该自由尝试审慎资本管制，特别是像巴西这样拥有适度规模外汇储备的经济体。这样的资本账户管制不应该成为全球最担忧的问题。

本文原题为“*Macroprudential Policie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本文作者为日本银行货币与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2 月刊于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大数据使用中的得不偿失

Samantha Bradshaw/文 陈博/编译

导读：本文思考了大数据使用中的问题，指出在缺乏隐私保护下，大数据的使用很可能会让人得不偿失。这其中包含隐私被泄露、身份被定位、信息被倒卖等风险。人们必须重视这类风险，并建立起相应的保护机制。编译如下：

政府、IT 企业、国际组织和人道救援机构都越来越视“大数据”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些问题包括食品短缺、价格波动、金融危机、疾病爆发和人道主义灾难等。从手机、社交媒体等来源搜集的实时数据能被细致分析挖掘，使得决策者对事情能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因此，在这些数据的帮助下政策制定能变得更加合理。然而，使用大数据存在着隐私和安全的隐患。这些风险一旦被忽视的话将令大数据的使用变得有害——换句话说，得不偿失。

人们正在通过科技的进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互通互联。2008 年，互联网连接的设备数量首次超过了世界人口。2012 年，全球有超过 60 亿手机用户。我们的互联产生了宝贵的储存在私人企业数据库中的数据矿藏。这些数据包括姓名、信用卡号等个人信息；种族、性取向等生活方式信息；以及网页浏览和购买记录等行为信息。

大数据和以往的调查数据相比，更具有实时性。海量的实时数据有助于展示出信息的模式、趋势和相关性，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世界。

意识到这点之后，不少国际组织，如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和经合组织国家（OECD）都开始尝试使用大数据分析工具。

然而，大多数的私人企业仍然是数据搜集和储存的主要力量。因此，大数据的公共使用仍然面临着很多防火墙和知识产权的障碍。这也使得推动私人数据为公共利益而公开分享，成为开源数据的运动相应而生。

开源数据（Open Data）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障碍，并能被公众所获悉。开源运动常被称为是有益于科学和社会研究、增加政府和机构透明度的有力工具。

全球脉动（Global Pulse），一个由联合国发起的开源运动就是其中的典型。运动希望企业能够在将数据匿名化后提供给公共组织，成为一种“数据慈善”。尽管这类运动的初衷是好的，但其中不乏重要的隐私和安全因素值得我们细思。

隐私是极为重要的考虑因素。首先，大多数互联网用户或许并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产生了数据。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产生的数据正被别人使用或者怎么使用的。更重要的是，大多数用户自己没有选择权。他们在使用互联网服务的时候签订了同意书——事实上面对垄断性质的服务提供商他们很少有替代品。

其次，数据常常被转手倒卖给第三方。这使得追踪数据的来源变得不大可行。

这些都会带来严重的隐私问题。曾经有研究指出，87%的情况下通过生日、性别和邮编就可以确定一个美国公民。这意味着通过数据很容易最终到个体。这就会给他们带来风险。比如政府或者组织可以通过这些数据追查到个人，并对抗议者实行报复。这在埃及示威活动期间就曾经发生过。政府通过手机数据追踪到了示威者。塔利班也曾经进行数据追查并威胁过2010年巴基斯坦洪灾救援中的国际工作者。2014年乌克兰政府还通过手机定位并群发短信，警告参与抗议的人群。

因此，缺乏对数据的有效保护和问责机制，大数据的使用不一定是好事，特别是对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必须对这些风险进行评估，并填补空白。

本文原题为“Data for Development: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本文作者为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CIGI）研究员。本文于2014年2月刊于该机构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欧洲银行进退两难

Marco Onado/文 孙东/编译

导读：本文对包含 20 个全球性银行在内的样本进行分析，观察金融危机后银行面临的困境。作者认为，欧洲银行对低杠杆率和高资本率的追求使之陷入了矛盾，对此问题的解决须借助于彻底的战略变化。编译如下：

金融危机已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这一长期讨论的问题推到了最前沿，表明银行比其自身（及其监管者）假装的表象更脆弱得多，这也是因为他们可将杠杆率推高至超过任何实业公司甚至对冲基金从未想过的高度。

从那时起，各国的政府和市场都敦促银行大幅增加资本，巴塞尔协议已被彻底修改，银行杠杆的长期上限也已出台。美国和欧洲的监管机构正努力让市场相信，目前银行已强大到足以抵御来自外部冲击、宏观经济或金融市场的任何影响。美国于 2009 年首次执行的压力测试，欧洲将在 2014 年复制的压力测试（逾期实现单一监管机制后），都是为了证明现在的情况是可控的。这样一来，至少在银行方面，金融危机的恐怖电影能找到一个幸福的归宿。

该阶段极为重要（尤其对欧洲而言），但尚不足以称之为一个“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生活”的解决方案。一方面，银行目前的资本水平（该水平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下去）同越来越多的经济文献建议的水平相距甚远。另一方面，更确切地说，考虑到来自市场和银行现有盈利水平的约束，未来银行资本（股票发行或留存收益）的可能来源或将低于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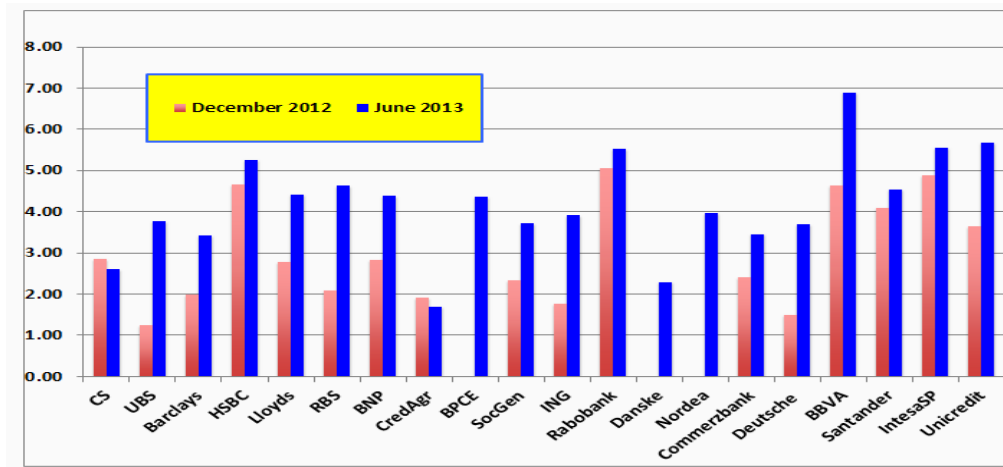
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分析了包含 20 个全球银行在内的样本，得到的主要结论是：金融危机后，银行还未达到新的平衡状态，如果银行真心希望在未来变得更强大，就必须实施彻底的战略变化，通过去杠杆化和/或大幅降低运营成本的手段减少非核心资产。

当前的杠杆率水平远非最优

尽管经历了近几年的努力，大多数银行的资本水平仍然非常低——至 2007 年底，仅六家银行（其中有四家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高于 3% 的门槛。此后，改善虽然已经很明显，但在 2013 年中期，有形净值占有形资产的比率（即纯会计项目的测量净值）从 1.7% 升至 6.9%。三家银行不符合

由巴塞尔-3 规定的 3% 的温和要求。若假设市场要求 4%，那么样本中有一半的银行仍会低于该水平。

图 1 有形净值/有形资产



金融危机后，银行资本的增长一直很显著，但这长期源于从银行转移到股东的资金的上升，即新股发行低于股息和回购。该结论也适用于所有对股东价值持短视观点的企业所引起的后果，甚至适用于一个行业，如银行业受到针对“稳健及审慎管理”的资本监管。

图 2 表明，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欧洲和美国，梅迪欧银行（Mediobanca）样本中的银行对其股东返还了巨额资本。金融危机之后，这一现象逆转了，但：

- 在 2000-2012 年整个期间，整体净流量要么达到最低值（如欧洲的 121 亿欧元），要么为负（如美国的 -288 亿美元）；
- 近年来，正净流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公共资金。

图 2 银行资本净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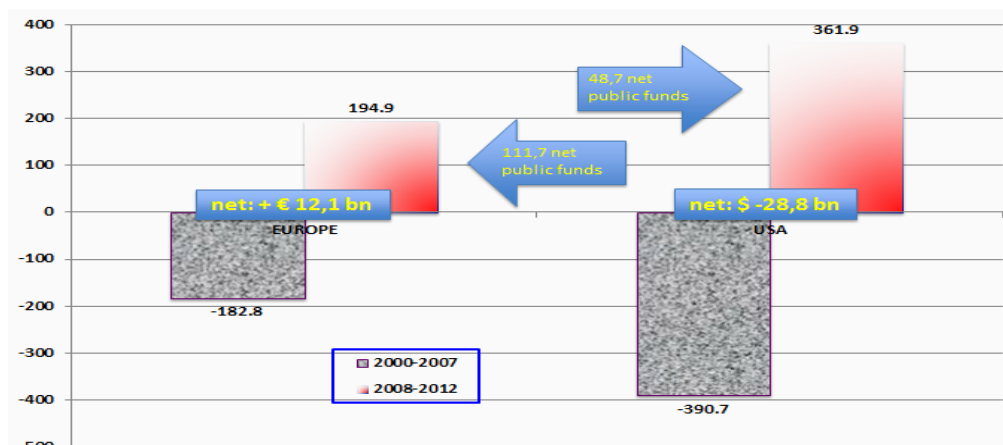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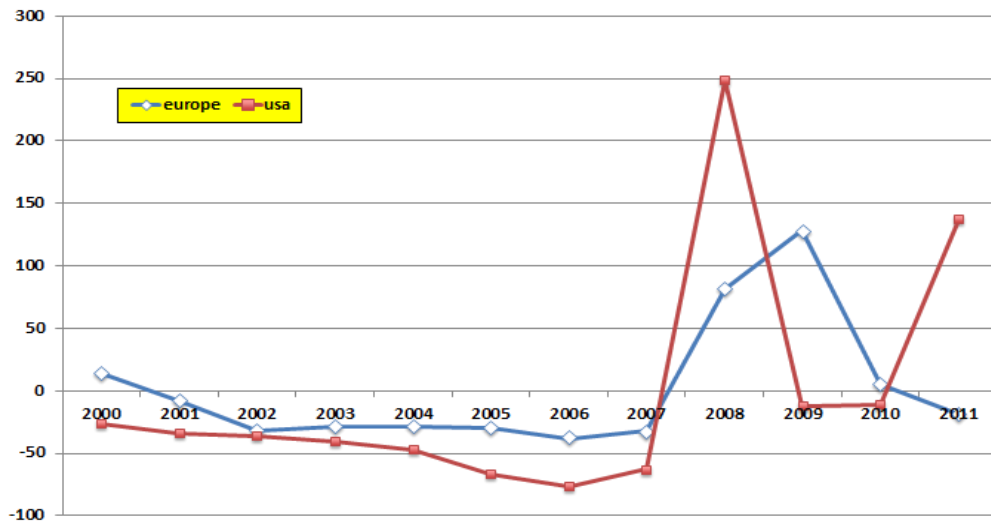


图 3 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年度净流量，也显示了几年显著的正净流量是罕见的，关键取决于政府资金的注入。如果银行未来的资本增加必须来自资本市场，股东必须扭转他们的条款或股利（无论是普通的还是特别的购回）的优先权。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证研究表明，银行股票的市场价格关键取决于股息的水平。这与有关利润分配不相关性的莫迪利亚尼-米勒假设相矛盾，但并不奇怪，因为“股利贴现模型”是最常见的估价工具之一。

图 3 2000-2011 的资本净流量



对输向主要银行系统的资金进行概括很不容易，因为我们缺乏关于股息和回购的汇总数据，但传闻中的证据似乎表明，这一现象正从梅迪欧银行的样本扩散到许多其他重要的银行。若是如此，至少反映出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

- 第一，银行的公有化不应再被视为禁忌。如果金融体系中存在空隙（可能处于为在欧洲的基础设施和长期投资融资的情况中），扩大现有公共机构的任务或建立带有特定任务、提供银行因利润低而拒绝提供的服务（即使这些服务可能对投资和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的公共中介是有意义的。同样，20 世纪 30 年代金融危机后的事实证明，公众的主动权对于重新启动经济的金融引擎、克服私人银行体系的市场失灵而言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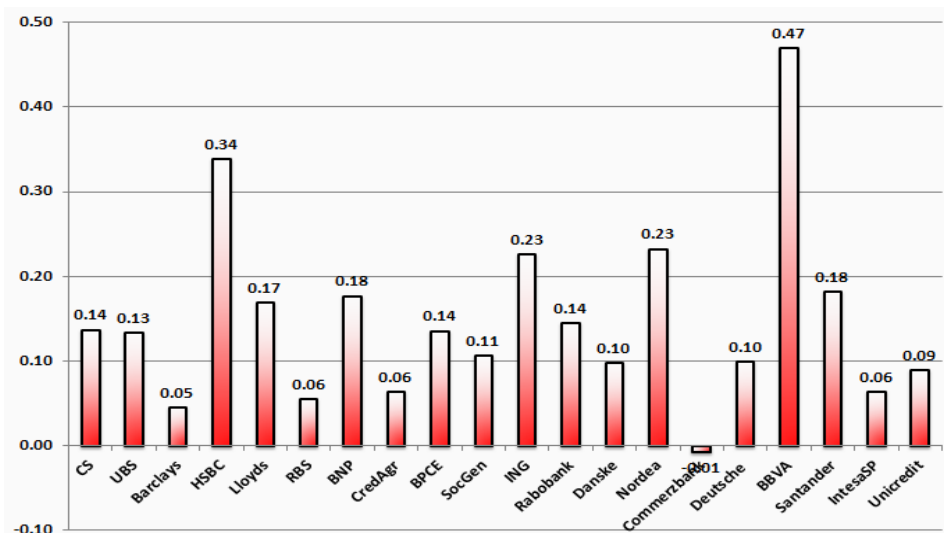
- 第二个政策含义是，大多数监管机构近年来使用的收益分配监管指导不是特殊的临时措施，但仍将是一个保持资本充足率的永久性工具。或者说，银行股投资者必须重新认识耐心这一美德，尤其当它在金融体系最近的发展中愈发罕见。

这一切都意味着，留存收益将是未来银行增加资本的主要渠道。但银行目前的利润水平足以使银行资本持续增加么？实证分析表明，即使从长期来看，很多银行系统特别是那些以零售为导向的（如意大利）银行系统在毛利润及净盈利上表现出下降趋势，正处于历史低点。

银行毛利润及净盈利均处于历史性的低水平

2013年，尽管欧洲经济衰退，并为不良贷款付出了沉重代价，银行的利润还是有所恢复，样本总体净利润总额为360亿，比2012年全年的195亿要高得多。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银行仍仅报告其前两个季度的总资产收益率在0.1-0.2%之间（净利润占总资产比例）。即使将这个数字翻倍用以估计年收入（这可能是相当乐观的），可见银行业务的盈利能力已从危机最严重阶段的低谷反弹，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图4 资产回报率：2013年上半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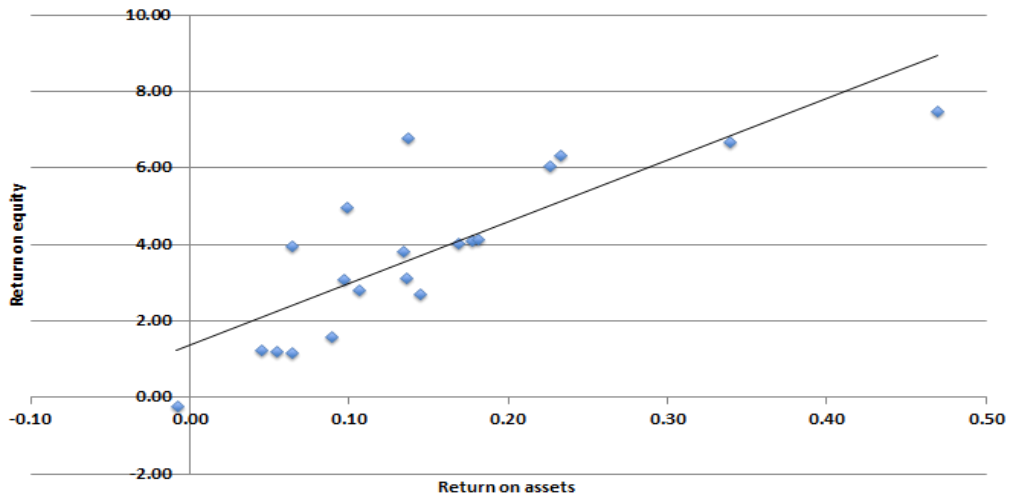


这两个后果。

- 首先，银行有动力继续保持现有杠杆水平，以取得“合理”的资产回报。

图5显示了梅迪欧银行样本的资产收益率与股东权益收益率的关系。银行对低于0.2的资产回报（按半年计算），特别是那些在趋势线之上的，要么接受较低的股本回报水平，要么放弃他们基于杠杆最大化的战略。

图 5 2013 年上半年的资产收益率/股东权益收益率



这意味着银行在应对危机的战略对策上应更进一步，一方面可通过减少资产推行去杠杆化，另一方面是显著降低其运营成本。至少可以认为，目前为止这两方面的反应都是温和的。最终的效果是，短期大幅度减少杠杆的阻力将非常强劲。

- 第二个后果是，通过保留盈余以增加资本的速度是温和的。

结论

综上所述，欧洲银行的情况似乎远未达到新的平衡。目前为止，银行的反应似乎都遵循细微调整的逻辑，因而强烈抵制对监管框架的根本性突破（如大力游说以反对栅栏原则、杠杆比率等）。只有当市场认为3%水平的资本是安全的，且股东能接受比过去更低的回报率（通过降低风险溢价）及支出，这种策略才可以算是成功的。然而，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是矛盾的——显然，在企业中，高杠杆要求高回报。

因此，银行将不得不寻找其他战略（和内源性）措施，如减少非核心资产、降低运营成本等。在这两方面，迄今的行动都不如预期那么“转型”。但是，由于银行不能被认为处于稳定的状态，用一部著名电影的标题来形容将非常贴切，那就是“爱是妥协”。

本文原题为“European banks: Between a rock (need of more capital) and a hard place (low profitability)”，作者 Marco Onado 是意大利博科尼大学的教授。本文于 2014 年 2 月 23 日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美国对华政策的两难选择：国防与经济

Ted Galen Carpenter/文 孔莹晖/编译

导读：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中国实力日益提升使美国感到不安。但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不同，美国的大部分盟国都不希望与华为敌，且中美经济联系紧密，美国不可能复制遏制苏联的成功。编译如下：

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美苏冷战时期，在国防问题上，美国相当容易地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因此决策者的首要目标是牵制苏联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大。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会有不同的观点，但美国在西欧和东亚的主要盟国都欢迎美国的军事部署并追随美国的领导。

在冷战期间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因素并没有使得该战略变得复杂。美国 and 苏联的贸易往来极少，峰值出现在 1979 年两国关系改善时期，为 45 亿美元。该值在 1987 年降至 20 亿美元，仅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的 1%。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集团间的贸易温和增长，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提出东方政策（*ostpolitik*）后，但贸易量并不足以使西欧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复杂化，国防问题就更不必说了。

当前，中美关系复杂得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和专家视中国为美国的新对手。他们至少赞同小布什在 2000 年竞选总统时宣称的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近期，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强硬表现，使得美国需要采取应对策略来抑制中国势力抬头的呼声渐长。虽然支持者很少使用“遏制（*containment*）”一词来描述其战略意图，但其特征与对付前苏联时的相似。

但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当前中美经济联系密切。2013 年，双边货物贸易达到了 5624 亿美元。中国也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人，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 1.3 万亿美元。而且该数额仍在快速增加，因为美国的年度联邦预算赤字接近或已突破 1 万亿。

美国应该避免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债权人为敌，这限制了美国遏制中国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倾向和能力。此外，中国与欧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国均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与冷战时期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完全不同。美国官员不

能总期望这些盟国会与中国为敌。与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谈话也表明，这些国家并不希望陷入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局面。

其结果是，有的时候美国对华政策是矛盾或举棋不定的。在东亚地区军事战略方面，从“重返亚洲（strategic pivot）”到“重整美军（rebalancing US forces）”用词的转变也反映了奥巴马政府不希望过度激怒中国。但中国领导人对此仍然心存疑虑，正如他们对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疑虑一样。最近奥巴马总统开始考虑邀请中国加入 TPP，但中国仍认为 TPP 只是美国为了与中国对抗所建立的另一个组织。

显然，美国领导人仍在为中国实力日益提升而苦恼，尤其是中国的战略倾向对其邻国造成了威胁，而其中的一些国家是美国长期的盟友。因此，美国被迫在中日钓鱼岛问题上站在日本一边，尽管这严重激怒了中国政府。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战略和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之间的紧张关系并不会很快缓和。那些认为冷战时期美国成功遏制苏联能够复制的政策专家和权威人士错得离谱。他们忽略了两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包括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愿意与华为敌。而且，虽然美国对中国的行动感到不安，但中美经济联系太过重要，美国不能因单纯的遏制战略而破坏双边经济联系。

遏制战略也不是必要的。中国与美国、东亚、欧盟间紧密的经济联系决定了中国不会冲动。在某些问题上，关系会持续紧张，但克制与合作会主导中美关系。必须牢记，当发生争端时，需要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分析。

本文原题为“Washington’s Dilemma with China: Security vs Economics”。Ted Galen Carpenter 是加图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2 月刊于 CATO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外国投资者：没有永恒的天堂

Maurizio Michael Habib 和 Livio Stracca/文 黄杨荔/编译

导读：全球危机巅峰时，美元升值、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这意味着外国投资者购买美国资产成为主流。事实上，他们不过逃入了短期国债中。本文认为，包括美国资产在内，没有证券能在不同危机中永葆避险资产地位。然而，美国证券的特殊性在于，即便危机源自美国，外国投资者也无须“竞相退出”。编译如下：

美元国际地位的弹性仍然惊人（Frankel，2013）。始于美国的全球危机巅峰时，尤其在 2008 年 4 季度，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且美元升值，导致对美国证券需求的普遍增强。然而，该证据意味着非美国居民相对“挑剔”——减少对美国长期债券的购买而逃入了短期债券，并甩开其他美国债券。因此，美国居民对外投资的回流（Bertaut 和 Pounder，2009）可能对美元与国债价格的调整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全球危机时期，对外资在美投资行为的分析引出了更多问题。众所周知，金融市场紧张时，跨境资本普遍具有回流趋势（Broner 等，2013）。

- 该法则存在例外吗？
- “高压”时期，外国投资者系统性地倾向于卖出（或买入）某些资产吗？
- 外国投资者的行为是否呈现出任何系统性趋势，如根据发行国家与证券类型将外国证券作为避险资产购买？

对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行储备货币的主要经济体中资产组合的系统性分析可见，不存在永恒的避险资产。避险资产指风险上升或预期上升时吸引投资流入的资产（Habib 和 Stracca，2013）。我们从外国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冲击对全球风险与风险厌恶（如雷曼兄弟垮台后）的影响，以及更天然的冲击（如欧债危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我们考虑了几种衡量风险的办法，揭示了全球不确定性与风险厌恶的影响，并考察了外需对许多自然因素的反应；对于欧元区发行的证券，通过使用欧央行的高质量数据，我们也控制了证券的净发行量。分析得出三项主要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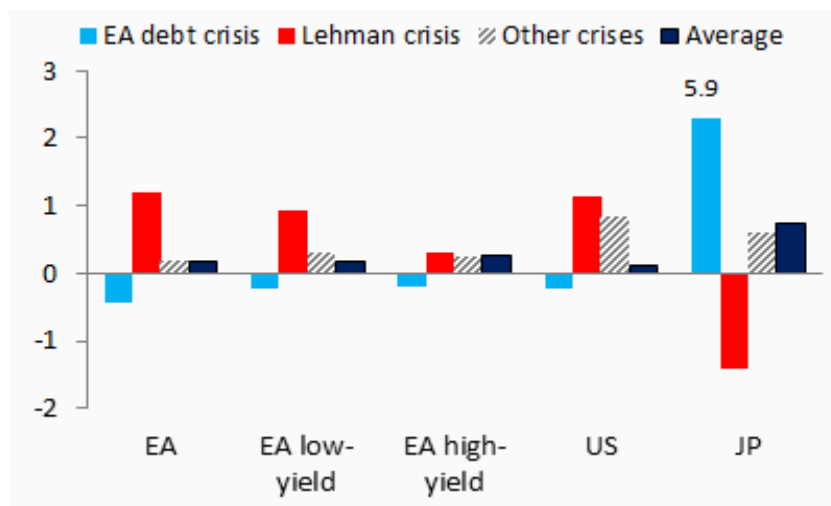
- 首先，危机时期和全球风险及风险厌恶上升时期通常伴随着净资产流出，表明外国投资者面临风险冲击时常“竞相退出”，证实了既有研究的结论（Broner 等，2013）。
- 第二，不存在如下资产或国家：在任何危机时期和面临任何风险冲击时，外国投资者对其需求都系统性地增加。

然而，至少在我们所研究的部分危机时期，美国、欧元区低收益国家和日本发行的货币市场工具表现得像避险资产。危机期间，外国投资者对短期货币市场工具购买更有弹性，少数案例中的购买量甚至高于正常时期（见图 1 的图表 A）。总体上看，外资依旧是危机时期长期政府债券的净买家，尽管其购买量较正常时期有所下降（如雷曼危机时对美国债券的购买降低），有时甚至成为净卖家（如 2011 年欧债危机时）（见图 1 的图表 B）。有趣的是，2011 年的欧债危机巅峰并未使更安全的欧元区低收益国家免受灾难——与正常时期相比，这些国家也遭遇了小规模的外资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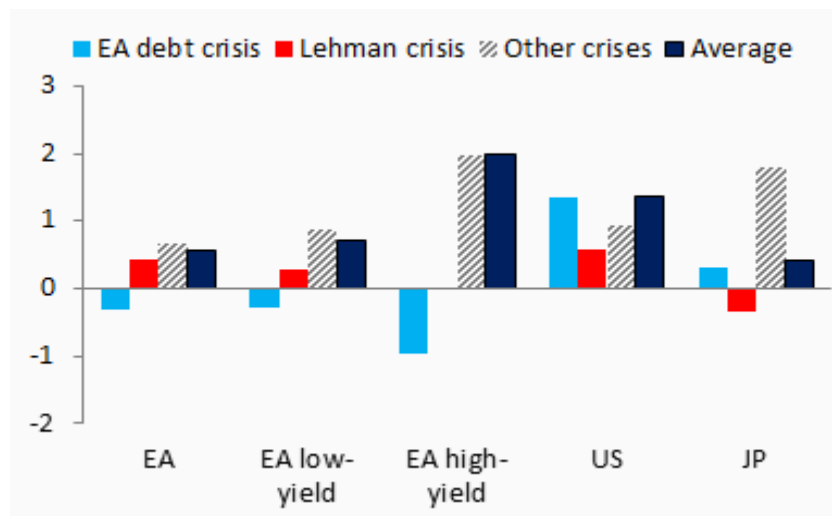
图 1 主要经济体的对外负债：以资产登记划分

1990 年 1 季度至 2012 年 4 季度（以在上年总负债组合的流通股中所占百分比计）

图表 A 货币市场工具



图表 B 政府债券



来源：IMF 国际收支表、国际金融统计和作者的计算。

- 第三，我们发现，遭受来自欧元区的冲击后，外资倾向于撤离那些属于危机源头的经济体（尤其是欧元区的高收益国），该行为在始于美国的危机中更为明显。

这可能在部分程度上反映出美国事件牵动全球的本性，也在部分程度上表明，美国居民发行的短期债务工具（以美国国债最为突出）是避险资产，即便在雷曼事件或其他源于美国的危机发生后，外国投资者对其的需求仍然更高。因此，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国的地位依旧带有一定特殊性。

本文原题为“Foreign investors and crises: There is no safe haven for all seasons”。本文作者 Maurizio Michael Habib 为欧央行高级经济师，Livio Stracca 为国际政策分析部主任。本文于 2014 年 2 月刊于 VOX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关于美国原油出口的十个事实

Frank Verrastro, J. Robinson West, Molly Walton/文 黄懿杰/编译

导读：页岩气和致密油革命之后，美国能源产量大幅提升；但由于遗留问题，美国原油面临着出口限制。作者列举了十点事实，认为应放松出口限制。编译如下：

在页岩气和致密油(tight oil)革命使得美国从能源进口依赖逐渐转变为自给自足，甚至出口的时候，人们开发各类模型，以分析消费者是否会受益。有一些主要的观点需要被反复重申：第一，虽然同为碳水化合物，石油和天然气的市场、使用和处理均有显著区别；第二，对美国石油出口的管制主要来源于1970年代石油禁运后所指定的政策。与现在不同，当时石油需求增加，但美国本土资源却十分匮乏。未来几个月到几年内，美国将出台一系列政策，提升国家能源安全，并使之与国家的经济、外交和环境目标相一致。以下提供十点事实：

1. 从纯供应量的角度，全球市场任何一个地方发现多余的石油对消费者都有利。其能够降低需求的竞争，对价格产生向下的压力。而且，原油（作为原材料）本身的成本占汽油价格的绝大部分，因此在其他因素不变时原油价格的上升将降低，而不是提升能源价格。

2. 当低价引致更高的需求时（暂不考虑环境问题），新增的供给能够满足新的需求，并对经济增长有益。如果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一部分产能会被削减，结果是全球剩余产能提升，从而能够用来缓冲由于供给冲击所带来的价格波动。

3. 美国一直以来倡导自由贸易。当需要多余的零件时，美国会在国际市场中寻找供应商。美国曾经大声呼吁，抵制那些控制产量、限制贸易并把战略性资源用于外交目的的行为。这一策略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不应该因为发现了一些新资源而被逆转。

4. 石油是全球商品，但不同石油在质量和特性上不同，对于炼油厂的价值也不同。位于美国墨西哥湾的炼油厂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富经验，能够将低质原油（一般价格也更低）转化为高价值的中间馏分油产品。随着美国的需求日渐下降，强迫炼油厂使用更多的本土轻质原油，会带来昂贵的基础设施投资，但并不会提升炼油厂的利润。虽然更高的利润率将允许本土炼油厂生产出大量油产品，但这一方法面临着技术和经济上的限制。通过禁止出口，强迫石油生产商关闭油井，对于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也并无裨益。相反，允许本土生产的

轻质原油（超出需求部分）出口将有助于改善贸易赤字，虽然美国仍需要进口更重的石油，以适应国内的供应设备。

5. 随着美国石油产量持续提升，基础设施可能难以再提供安全而可负担的物流服务。在对该产业的中游投资中，时机和次序的把握非常重要，因为相比上游生产，中游投资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就位。下游（炼油）基础设施的改变则需要花费更长时间。因此，产生的净效应是，变革将会发生，但市场和物流系统需要花费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一变化。在此期间，将会出现季节性因素、市场扭曲和价格不动，甚至常常看起来违反常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一些政策遗留问题进行重新评估，包括 Jones Act 的要求，以及战略石油储备的规模、处置和管理等。

6. 远期曲线（Forward Curve）的重要性在于：在钻机技术效率，水力压裂和采收技术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钻机设备数量等不再是未来产量的准确代理指标。页岩气发展的成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价格下降，使得生产非传统原油变得不再划算。目前的产量水平也许能够维持，但新的投资将面临风险。允许出口将增加这类原油的市场。

7. 随着非传统原油和天然气生产技术的进步，许多国家将开始追求在本土生产能源，包括化石燃料。这种趋势需要气候、安全和运营管理和监管进行匹配，减轻其在当地和全球的影响。虽然存在这类非传统资源的开发会扩大化石能源未来前景的担忧，实际上其将为下一代清洁能源技术提供喘息之机。

8. 随着能源和投资模式转变，地缘政治结构也将相应改变。这将改变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并为已存和新增的区域和全球伙伴提供机会和挑战。

9. 非传统资源的开发将补充、而不是取代传统原油和天然气供应，市场力量仍将居于中心。美国将马上超过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液体能源生产国，但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都很重要，因为其占全球供给的 1/3 强。另外，即使美国成为最大的供应国，它仍将是主要的消费国和进口国，因为美国的产量大约为 11 百万桶/天（mmb/d），但需求则超过 18.5mmb/d。

10. 随着环境的变化，将有必要开发一套更好的信息、诊断/分析和指示系统，以识别正在出现的趋势和模式，为新的挑战提出应对之策，并及时而有效地进行处理。没有什么确定或者永恒的，因此政策需要对变化的环境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

本文原题为“Ten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Oil Exports”。作者为 CSIS 能源和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表于 CSIS 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中国改革从空气开始？

David Parker 和 Matthew Goodman/文 程覃思/编译

导读：北京污染已“接近不适宜人类居住的程度”。2012 年以来，中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防治空气污染，建设“生态文明”。但是，防治污染措施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行政命令式的措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此，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编译如下：

近期，两个中国智库称，北京空气污染严重，已“接近不适宜人类居住程度”。空气中高浓度的微粒导致沿海地区频繁出现雾霾天气，航班停飞，甚至影响到了美国加州。但是，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可能会阻碍其全力净化空气。为了使北京的天蓝起来，高层领导人需要调整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鼓励实现由工业驱动的快速经济增长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的转变。

2012 年以来，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环保部定期发布 100 多个城市 PM2.5 监测数据。为了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生态文明”，去年九月，中央政府宣布，未来五年内将在空气治理上投入 2770 亿美元。今年一月，北京要求 15000 家大型工业企业公布空气和污水排放的实时数据（这曾被视为“国家秘密”）。地方政府也纷纷行动，如去年 11 月，北京市政府关闭了 500 家露天烧烤，甚至考虑禁止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

河北：防治污染将会影响经济增速

看看河北省，我们才知道政府面临着什么挑战。在加入 WTO 以后的十年里，河北省的经济总量增长超过五倍，这主要来自于工业部门爆炸式的发展。如今，该省钢铁产能占到全球 11% 以上，成为一个能源密集型的重工业中心（如化工业）。为了给工厂提供动力，河北不得不使用煤炭，因为这是当地唯一可大量提供的廉价能源。

这不仅给河北带来了严重的空气污染（根据环保部数据，全国十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河北省占了七个），而且还影响到了周边地区。据估计，外来污染物大约占到了北京 PM2.5 污染物的 30%，超过了汽车尾气和建筑业排放之和。虽然 2014 年经济增长的目标为 8%，但是河北必须得考虑其对北京空气污染带来的影响。

根据 2013 年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 2017 年，京津冀地区 PM2.5 平均值需下降 25%。此外，三地政府与环保部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能否达标将会影响主要领导人的升迁。尽管中央政府拿出了 10.5 亿美元来加强地区合作，上述目标仍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增长。河北省受到的冲击尤为严重，环保部已宣布将关停该省 8000 多家重污染小企业，省领导决定显著减少钢产量和煤炭消费量，拆除部分现有设施。

行政命令的局限性

在防治污染的战斗中，行政命令式的措施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根据空气污染预警等级限制工业活动和汽车使用，有助于缓解当天的空气污染状况。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污染企业会选择则在夜间开工，规避严厉的管制措施。对税收需求和对大规模失业的担心也会影响政策执行的力度。例如，河北省唐山市仍有 40 万钢铁工人。

不再以 GDP 来考核官员会带来复杂的影响。新的评价方式包括了环境质量目标（如平均 PM2.5 值），但是，在考评期，对于当地官员来说关停工业企业的数量显得更为重要，这将会影响到就业和财政收入。

政策建议

北京要成功地处理环境变化问题还需要调整现有政策。首先，改变直接或间接促进重工业投资的现有政策，例如，价格控制使企业能源成本低于市场水平。其次，财政改革也是全面治污的重要因素，应当取消对持续亏损企业的支持，改为培养环境友好型企业。最后，北京应当继续扩大环境监管部门的职权，采取措施使企业承担全部的排污成本。但这些措施短期内不会消除经济增长和环境破坏间的紧张关系。

本文原题为“China: reform in the air?”。本文于 2014 年 2 月刊于 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网站。作者为 David Parker 和 Matthew Goodman。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乌克兰的三个方案

Nicu Popescu/文 李骁/编译

导读：在过去的两周时间里，乌克兰经历了两次主要冲击。乌克兰的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为暴力的变革之一，而且不仅限于原苏联范围。俄罗斯军队对克里米亚的干涉，极具争议性地构成了自 1990 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以来欧洲最大的安全危机。这些事件将继续伴随着乌克兰国内外相互矛盾的叙事和相互冲突的宣传。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管理危机造成的政治失控并吸取教训，以防止相似的事件在未来再次发生。思考未来政策应对的一个有用方式是，围绕可能的方案来组织它们。对于乌克兰来说，可能至少有三种方案：回到过去的状态、克里米亚的“德涅斯特化”，以及一个充满更多军事干预的未来。本文由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的尼库·波佩斯库撰写。编译如下：

过去的状态？

回到过去的状态，即克里米亚回归乌克兰政府的管辖之下。在这一方案下，克里米亚当局将会服从于基辅，当地的政策、边防和税务都将与乌克兰的合法框架相匹配。这一方案现在看来极不可能。从俄罗斯出兵和打断乌克兰政府机构正常运作的那一刻起，克里米亚当地的军队、政府和边防力量，均无力抵挡俄罗斯。

独立的政治实体从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逐步地、痛苦地分离出去花了两到三年的时间，而相同的事情在克里米亚只花了三天时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冲突中，这一过程主要是自下而上发生，俄罗斯由于困扰于其国内危机而只能提供有限支持。在克里米亚却不然。首先，俄罗斯派出了军队，然后当地人解散了乌克兰在该地区的国家机构。迅速的、目标明确的军事行动推动了改变的发生，这只需几个小时，而不是几年。

乌克兰的“德涅斯特化”？

第二个方案是克里米亚的“德涅斯特化”。正如克里米亚目前正在计划的那样，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在 2006 年举行全民公投，98% 的人投票加入俄罗斯。虽然该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但完全的合并并未发生。

还有，就像摩尔多瓦闹独立的地区一样，这预示着国家实际控制的丧失、长期而徒劳的谈判，政权结构被架空，俄罗斯事实上的政治控制、经济 and 军事关联得到巩固。因此，克里米亚当局将会拒绝承认基辅作为一个合法的、更高的权威。为了更直接地接近克里米亚并确保其控制，俄罗斯也极有可能在刻赤海峡架一座大桥。另外，俄罗斯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欧安会和联合国的调停，并推动

克里米亚和基辅在权力分配上的对话。纵观这些谈判，俄罗斯的立场是，尽管它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需要基辅和辛菲罗波尔化解分歧。在德涅斯特的案例中这一过程持续了 22 年，且并未使冲突各方找到解决方案。

这一方案对俄罗斯有利，莫斯科完全有能力资助克里米亚。如果面对外交压力，它也可以归咎于克里米亚的落后。在此情况下，基辅会转向北约和欧盟，莫斯科有权选择承认克里米亚独立，或吞并克里米亚。俄罗斯将会阻止乌克兰政府的行动，以等待解决克里米亚冲突的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多种地缘政治让步。

这一模式已经被俄罗斯在德涅斯特努力过、试验过，而且运作良好。它代价小，能够带来潜在的地缘政治利益。尽管这可能既不是做最坏打算的方案，也不是最有可能的一种。

未来被干涉？

如果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得不到严厉谴责，未来将无法阻止其再次作出相似的事情。仅仅一个月前还很少有人认为俄罗斯会无故入侵其邻国。如果这一干涉没有任何重要结果，我们将很难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或其他原苏联国家的军事投机。

当然，2008 年的俄格战争警示人们，莫斯科认为大规模军事入侵是一种可能的对外政策手段。然而当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都被认为在扩大其冲突中扮演了一个角色时，（双方）对冲突的军事化一定程度上有共同责任。但在克里米亚的案例中，过失不在乌克兰：并不像卡德里·里克所说的仅仅是一个当地的俄罗斯人被杀，也不是最近几周在乌克兰的政治环境中有俄国人在基辅独立广场的抗议中被狙击手射杀。

如果数个月相对的外交孤立没有给俄罗斯造成实际和持续的损失，普京将会保持更强硬的姿态。获取克里米亚使其获得了国内支持，甚至包括过去反对他的团体，例如共产主义者和极端民族主义者。普京也相信，无论在哪里有可能颠覆苏联被瓦解的局面都是他的责任，而克里米亚是其崇尚这一历史使命的有力象征。最后，保持对克里米亚的实际控制是另一个砝码。这不仅因为它是一份有价值的财产，还因为它将成为未来任何乌克兰政府做出外交政策抉择时的约束。

几个被取消的峰会，伴随着估计一年以后将实现的正常化都不会严重影响莫斯科。俄罗斯股市的表现暗示了这一点：它在干涉发生后的第一个星期一遇挫，但在几天之内就几乎完全恢复。普京确信其国家的外交地位将也会很快恢复。一旦这件事发生，总统可能会问自己“为何不再试试这一策略”？

像在克里米亚这样的军事投机可能需要冒险，但它们也可能完全成功。为未来这样的投机创造的机会和可能的借口充满了原苏联的范围。如果是这样，克里米亚的情况最终会实现普京的意愿，它将阻止东乌克兰的其他部分甚至是敖德萨的相似军事行动，乌克兰最大的港口位于距离德涅斯特大约半小时车程的地方，那里驻扎着 1300 名俄军士兵。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哈萨克斯坦可能将会发生一连串危机，那里的政治暴力将导致俄罗斯转而“保护”其同胞。如果阿塞拜疆的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其目前的统治者和反对派之间势均力敌，俄罗斯会转而确保北阿塞拜疆不受“不稳定的”其他地区影响吗？

所有这些令人担忧的方案都有可能紧随在克里米亚所发生的事情（而发生）。为了减小这些方案物质化的几率，俄罗斯的行动可能不得不迎合超出外交信号的应对。据 3 月 6 日的欧盟峰会做出的决议，欧俄关系的未来要看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的行动。

本文原题为“Three scenarios for Ukraine”。本文作者尼库·波佩斯库（Nicu Popescu）为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资深分析员。本文于 2014 年 3 月 7 日刊于法国欧盟安全研究所网站。点击此处可查看原文。

乌克兰何以能迈步前行？

Dalibor Rohac\文 杜哲元\编译

导读：要想知道乌克兰向何处去，就应当知道导致其动荡的根源——寡头精英对普通民众生活的漠视以及对俄罗斯的政治误判。而乌克兰成功转型还是有希望的，希望在于改革——能源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制度改革。作者认为美国介入到乌克兰的转型进程中并非是明智之举，而欧盟的帮助和一些东欧国家的经验对于乌克兰的成功转型却有着重要意义。现编译如下：

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距今已经十年了，这场革命给乌克兰带来的希望是从前苏联的历史包袱中解脱出来，并加入到中东欧成功转型的国家的行列。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再来一次革命的话，乌克兰的状况是不是会变得更好呢？要想知道乌克兰向何处去，就应当了解导致其总统亚努科维奇被放逐的动荡根源。

首先，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乌克兰一直被寡头精英所统治，他们很少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其中的证据不仅有总统亚努科维奇那俗气的豪宅，还有一个铁定的事实——在 1990 年乌克兰和波兰的人均收入还处于相同的水平，而到现在乌克兰的人均收入仅仅是波兰的三分之一。

其次，历届乌克兰政府都延续着对俄罗斯的政治误判，而克里姆林宫却一直都认为乌克兰只是依靠其天然气供给的附庸国。在乌克兰政府执行了莫斯科的指示并取消与欧盟的广泛的协议之后，乌克兰民众按耐不住了，现在政府试图依靠恐吓来使民众屈服的计划也适得其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利用局势来扩大对俄语区的东乌克兰（特别是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港）的政治要求。随着克里米亚临时内阁的成立以及五月下旬举行新总统选举的确定，不管乌克兰的领土让渡是否会成为事实，它也必须承认其过去二十年统治的失败了。

技术官僚并不能解决乌克兰所面临的问题。但是在纯经济学的问题上，希望并不渺茫。尽管乌克兰正面临着严重的资金流动性问题，但它却并没有长期的高负债率——它的债务和 GDP 之比仅为 40%。

当然，乌克兰尚有机会进行重大变革。比如在能源领域，这个国家的能源部门仍然是国有的，并接受大量的政府补贴，而这纯属浪费和不稳定的，它使乌克兰过于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如果乌克兰能源市场解除管制并进行私有化，同时这些私人投资者去开发国内天然气的话，乌克兰的能源状况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此外，乌克兰的破产法亦需要修改，现在这个问题和高额的商

税、对投资者保护的不力以及官僚主义混合在一起，使乌克兰不再具有良好的商业和投资环境。

不难看出乌克兰问题的本质是在制度方面。长久以来，这个国家的政府把乌克兰经营的像是在为一小撮寡头而挣钱的公司，它的公共服务和司法制度始终被腐败问题所困扰。根据透明国际的报告，2013年乌克兰和喀麦隆、伊朗、尼日利亚、中非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起在腐败认知指数中被排到高危行列，并且还面临着来年继续下滑的危险。乌克兰新领导的关键任务就是要效仿格鲁吉亚而与自己的过去做彻底的告别。2007年，因为腐败问题，格鲁吉亚政府解散了全部警察力量，然后就以一个更加精干的组织结构将其替换，同时又以严厉的保障机制来抵制贿赂行为。所有的政府部门都关闭了，将近三万名公务员被解雇。由于乌克兰各级政府常年的不受制约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泛滥，所以除非乌克兰新政府采取一些大胆的措施，否则的话要实现乌克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难以想象的。

指望美国涉入并指导乌克兰转型可能是不现实、不合理的，毕竟乌克兰的命运掌握在乌克兰人的手中。当然，欧盟对乌克兰进行援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任何大规模的援助或是“马歇尔计划”却都将会对乌克兰产生反作用，特别是考虑到其缺少坚实的制度来防止任人唯亲和资金盗用。

不过仍然还有很多好的途径来帮助乌克兰实现成功转型。波兰、捷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能为此提供价值非凡的经验。而更重要的则是欧盟成员资格的前景——它为乌克兰的决策者进行改革提供了激励机制。同时，也不必等到乌克兰加入到欧盟，它就能够享受到很多欧盟成员所享受的利益。目前，尽管欧洲有着移民加剧的恐惧，但是和乌克兰进行自由贸易并对其开放资本和允许人口流动可达到双赢。

本文原题为“[How Ukraine Can Move Forward](#)”。本文作者达利波尔·罗安奇 (Dalibor Rohac) 为卡托研究所全球自由与繁荣研究中心的政策分析师，本文于2014年2月28日发表于CNN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埃尔多安在德黑兰

Gönül Tol /文 丁工/编译

导读：2014年1月28~29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德黑兰同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首次会晤，土耳其分管外交、能源、经济的三位部长一同参加了会谈，现将该文编译如下。

促成此次会谈的缘由？

虽然是伊朗邀请埃尔多安访伊，但土伊两国都希望扩大双方合作，特别是在能源领域。土耳其是能源资源匮乏的国家，因此即使在国际社会加大对伊朗制裁力度的背景下，土耳其依然计划增加从伊朗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土耳其进口伊朗天然气相当大部分用于发电，而伊朗也是仅次于俄罗斯的土耳其第二大天然气进口国，伊朗也在努力寻求占据土耳其能源市场更大的份额。2012年，两国达成将双边年度贸易额从220亿美元提升至300亿美元的共识，并且双方都将实现该协议目标作为施政工作的优先方向。

两国间的其他贸易会否受到制裁强化的影响？

依照有关伊朗核计划达成的临时性协议，世界主要大国暂缓包括黄金交易在内针对伊朗的各项制裁措施。暂缓制裁将会使伊朗大约70亿美元的资金获得解冻，而这部分资金的使用有助于促进土、伊双边贸易。伊核协议的签署成为土耳其和伊朗之间恢复黄金交易的敲门砖。2012年，土耳其对伊朗的出口额高达99亿美元。但由于制裁对黄金贸易的影响，该数值急降至2013年的34亿美元。因此，针对伊朗黄金贸易制裁的放松管制有利于土伊贸易。

土耳其和伊朗对叙利亚的不同立场会妨碍两国贸易吗？

事实上，土耳其和伊朗因为彼此支持叙利亚内战中的对立两方导致两国关系趋向紧张，但是两国都无法承担长期的关系紧张。从土耳其方面来说，伊朗是重要的能源伙伴。因此，埃尔多安访问伊朗意图努力修复双边关系，为进一步扩展两国贸易奠定基础，更何况随着现在过渡协议的签订，伊朗能够为贸易伙伴提供更广阔的合作平台。

同时，土耳其当前也调整其叙利亚政策，加强同伊朗的战略协调。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卢和伊朗外长扎里夫最近发布的联合声明显示：“土耳其和伊朗在使用非军事手段结束叙利亚危机问题上达成一致共识。”此举意味着土耳其关于叙利亚政策的重大调整转向。

土耳其此次外交政策转变的根源？

在过去的两年，土耳其一直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严厉措施包括采取军事行动来更迭阿萨德政权。但是奥巴马政府决定放弃军事打击叙利计划，沙特从土耳其、卡塔尔手中接过叙利亚后台的任务以及美俄达成销毁叙化武协定，这是事件导致土耳其政府在国内和地区都被受孤立。土耳其大力扶持本国境内的叙反对派，但这些土耳其盟友在叙利亚反对派团体中的影响力也大不如前。而战场方面，反对派中的主要军事团体也是和沙特更亲近。结果，土耳其在叙利亚中的作用日益减弱。美伊关系的缓和使土耳其在地区事务和参与国际社会介入叙利亚危机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增大。

当前，土耳其似乎已经接受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基于教派冲突和反对派内部不同派别的矛盾，阿萨德即使将来下台已不会结束叙利亚的暴力流血状况，而政治接近是唯一的出路。土耳其似乎重新定位伊朗的地区新作用，并且也不反对伊朗在叙利亚和土耳其之间调停作用。

本文原题为“Erdogan in Tehran”，在2014年1月29日发表于美国中东研究所 Middle East Institute(MEI)网站。单击[此处](#)查看原文。

我们对美国的不安感

NAKAYAMA Toshihiro/文 马文龙/编译

导读：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上台以来美国不断调整对外政策，在调整美国全球反恐战争布局 and 重返亚太的同时，又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这引起部分日本学者的担忧，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将转向保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现编译如下：

简介

美国政府已经转向保守了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的出现可以看做是这样一个转变的标志。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所设定的施政目标之一就是修正布什时代的过度干预政策。由于9·11恐怖袭击的影响，为了消除威胁，美国政府转向更加积极地的干预政策。

评论

无疑，许多美国人的脑海中有过这样的疑问，他们推选奥巴马担任总统寻求处理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的新方法，是否可使美国更安全或者只是进一步加深了美国与国际社会的鸿沟？

世界欢迎奥巴马总统对外政策所作出改变，在改造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关系方面，奥巴马将布什的“反恐战争”修改为“对暴力极端主义的战争”，并从“消除威胁”改变为与世界其他国家“寻求合作的可能性。”虽然美国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并不需要做出大的变动，但是这一观念的转变是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的核心。

无论是早期强调的加强与穆斯林世界的“对话”，还是“再平衡政策”美国外交政策的轴心转向亚太地区，都是奥巴马总统全球观的产物，他将国际政治视为“空间的可能性。”在日本有一种倾向，认为这一再平衡的政策是美国对中国迅速崛起的回应。但亚太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地区，美国的首要意图是在再次参与地区事务中获得更加稳固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是孤立主义的表现，是一种错误的看法。

然而，奥巴马试图采取不同与“布什主义”及其所采取的过度干预的外交政策，同时他也摒弃了美国根植于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理念。在与一个无限多样性的世界接触时单一原则极大地限制了美国的行为，因此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必须采取和定制与之相应的对策。这种敏感性也许刻画出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的特点。尽管如此，在密切关注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时，世界一直在寻找

某种类型的一致性，并试图对它进行类似于教义解读。

奥巴马政府根据其他地区国家的主观反应对外交政策作出调整的努力这本身将为国际政治提供新的动力。鉴于从个体反应难以辨别一致性，美国的转变将使国际社会更加“困惑”。

从内向视角例如美国国内民众厌倦了战争使美国外交行为受到约束；极端的极化程度政党路线，使得管理机构功能失调；以及财政限制使美国的全球战略存在不确定性来看，这些因素共同为我们创建“非介入性美国”的映像。对这一映像的完美体现是美国对叙利亚局势所作出的回应（决定干预而不非实质性干预）。

虽然亚太地区欢迎美国的重返亚洲，然而一个模糊关于美国的一致性的不安已经出现。如果美国奉行的政策一贯强调亚太地区，这将需要对中国采取坚定的战略，即一个计划，以应对中国的崛起。然而，从美国传出来的消息确实混乱的。一个明确的例子是总统顾问苏珊·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对中美关系的描述。几乎不需要进行再次指出我们很多人对“实施大国关系新模式”，出现在她的讲话中感到困惑。

对于亚洲国家，中国的存在是一个“地理命运”。虽然美国可能会由于亚洲国家的反对而取消监控，但是我们不能放松我们的审查。毫无疑问美国因被批评为“帝国主义”而感到沮丧，因此需要一个更为谨慎的态度决定何时进行干预和“撤回”。然而，这是美国的全球影响力的必然结果。世界现在关注的是，在美国，受国内政治考虑的限制可能会向内转变。这可能确实是有点反应过度，但它是一个明确的事实，这不安本身就是推动一个变化的力量。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可能认为国际政治是“空间开放的对话”，但世界其他国家仍然认为国际政治是“权力之争”并对美国的“不行使”权力作出灵敏的反应。无论它多么倡导“积极参与”，只要这种认知差距存在，奥巴马政府将无法驱散“非介入性美国”这一形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种国际政治的权力真空以及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增加。

本文原题为“OUR SENSE OF UNEASINESS ABOUT AMERICA”。本文作者 NAKAYAMA Toshihiro 为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并在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Jap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担任客座研究员，本文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发表于日本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单击此处可以访问原文链接。

本期智库介绍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简介：1964年由美国海军上将阿利·伯克和大使大卫·阿希尔成立。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跨党派的外交政策智囊团。CSIS主要就经济和安全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和政治战略分析，其重点放在技术、公共政策、国际贸易和金融、能源等。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SIS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1名。

网址：<http://csis.org/>

Adam Smith Institution (ASI) 亚当斯密研究所

简介：ASI是英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策自由化的改革领导者。它以《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命名，方针是经济自由主义。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立以来，它在积极实践把选择和竞争引进到公共服务上来，在巩固个人主义、减税、消减落后法规和杜绝政府浪费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协会通过他们的研究、报告、学术会议、政治家和期刊的简报、网站和博客、报纸、广播和电视来推广和散播他们的理念。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ASI在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7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0名。

网址：<http://www.adamsmith.org/>

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IIE)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简介：由伯格斯坦（C. Fred Bergsten）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在美国智库。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2年全球智库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PIIE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15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5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3名。

网址：<http://www.iie.com/>

Cato Institute 加图研究所

简介：加图研究所位于华盛顿特区，成立于1977年，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型智库之一。加图研究所以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为思想根基，致力于“扩展公共政策辩论维度”，通过独立、超越党派的公共政策研究和讨论，旨在“恢复小政府、个人自由、自由市场以及和平的美国传统”。加图研究所的政策分析曾经影响过里根政府和布什政府的政策。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加图研究所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19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2名，全球50大国际经济政策智库第17名。

网址：<http://www.cato.org/>

The 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CEPR)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简介：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成立于1983年。它包括七百多位研究人员，分布于28个国家的237家机构中（主要是欧洲高校）。其特点是提供政策相关的学术研究、并关注欧洲。Voxeu.org是CEPR的门户网站，受众为政府部门的经济学家、国际组织等。它的文章多为与政策相关的工作论文初稿，比财经报纸专栏更为深入，同时比专业学术文章更加易懂。在《2012年全球智库年度报告》（The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2012）中，CEPR在全球（含美国）150大智库中列第27名，全球80大国内经济政策智库中列第18名。

网址：<http://www.voxeu.org/>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IGI) 国际治理创新中心

简介：CIGI是关注全球治理的独立智库，由Jim Balsillie成立于2001年。它的主要活动包括资助研究、创造交流网络、促进政策讨论、提高多边治理能力。具体而言，它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全球经济、环境与能源、全球发展、全球安全。它致力于将学术应用于政治，通过优秀的研究与分析来影响政治决策。

网址：<http://www.cigionline.or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介：IMF于1945年12月27日成立，为世界两大金融机构之一，职责是监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技术和资金协助，确保全球金融制度运作正常，其总部设在华盛顿。IMF主要通过监督、贷款以及技术援助和培训三大职能来促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IMF的工作论文及其他出版物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研究方面拥有巨大影响。

网址：<http://www.imf.org/>